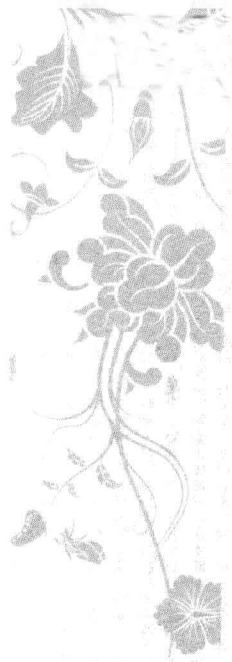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精品
年度佳作2013

耿立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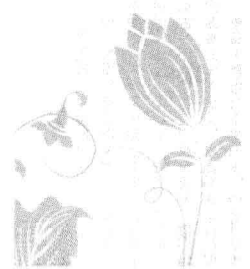


贵州
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史精品 年度佳作2013

耿立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 2013 / 耿立主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221-11580-5

I. ①中… II. ①耿… III. ①文史—中国—2013—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7206号

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 2013

Zhongguo Wenshi Jingpin Niandu Jiazuo 2013

主编 耿立

责任编辑 康征宇 范春雪 张忠凯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380千字 印张 18

ISBN 978-7-221-11580-5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序言 站在历史的那一边

文 _ 耿立

在中国，世俗和时间之外，还有更高的意义和权威存在么？在人之上，是否有个高于个人的神性，一直不是十分的明晰。但是有一个独异的现象，国人敬畏历史，相信历史的神圣和绝对的权威以及不可悖谬。

何谓历史？历史何谓？英国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并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

是的，历史是有记忆的，并且历史最重要的是有最后的审判：千秋公论。于是，历史成了中国的一种不思宗教的宗教情怀和价值尺度。

我要说的是，再狂妄的人也高不过历史，地上的万国和意识形态，也高不过历史，但是有时强权、国家的崇拜和意识形态的崇拜，却一再羞辱历史，他们打扮着自己在历史中的身份，恶的漂白。

电影《窃听风暴》中冷血无比的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的言行。他二十四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当维斯莱尔准备汇报剧作家将秘密给西德写稿的消息时，他上司偶然谈论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人属于第三种，叫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于是貌似强大的政权在历史面前的虚弱就出来了。历史的定位给维斯莱尔带来了一个提醒，于是他悄悄收起了报告，决定站在历史那一边。

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开头：1802年3月，正是法兰西与英、俄、西班牙等国在亚眠磋商和约的时期。这天，拿破仑浴后照例要量量身高。他矮矮的身材，健壮的体魄，深邃的眼睛，显得特别精悍。“啦啦！我有多高？”拿破仑一边哼着歌，一边问他的侍从康斯坦。康斯坦淡淡地说：“老样子，一米六八。”拿破仑有些急躁了：“看准些，蠢东西！嗯……”“高了五厘米……”

康斯坦连忙答道，可当他发现拿破仑是踮着脚量身高的时候，不觉笑了，“啊，老是要花招。”拿破仑像是命令，又像是恳求地说：“康斯坦，将来你要是写回忆录，给我加五厘米，嗯，一米七三。嘘！天底下只有你知道我真有多高。”

这个电影镜头，使我不得不说：历史只承认被记录下的东西，于是历史难免被要挟被涂改被强权玷辱，于是《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皇帝史，与百姓何干？什么是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必要性。”此话验之拿破仑与仆人康斯坦的对话，确实是揭示了一种历史存在。

拿破仑的仆人康斯坦是诚实的，也许他在心中有历史的敬畏，他的回忆录里说拿破仑“身高5尺2寸3分”，这相当于1米685，也就是168.5公分。法国当时的顾贺高将军在1815年9月8日亲自量过拿破仑的身高，而且记在日记里——“5尺2寸半”，相当于1米692，也就是169.2公分。拿破仑去世后，安托马奇医生验尸时候量的高度是5法尺2法寸4法分。但历史处处有歧路，后来人们将法尺当成英尺去换算，结果造成了拿破仑身高只有1米57左右的讹传，并且人们相信了，这个巨人个子虽矮，但影响却长。

人是根据记载来复原历史的，但记录是有选择和遗漏的，史料也不能包办一切，但史料记载，却是我们复原的基础。历史曾发生过的，也许没有记录，对记录的我们都能认可么？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那这就要凭记载者对历史的敬畏和良知了。但把历史的真寄托在写作者身上，也是危险的。但人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在中国，民间有个人记录的传统，这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补充。

历史是可以作假的，也是可以装扮的，但每每这个朝代过去了，历史才可能复原出原貌，于是人们对历史的公正也就充满了期待，比如岳飞冤死二十一年之后，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而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九十九年。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在西方，迟来的正义不算是正义，在中国，这却是一种期待，一种价值。

吴思先生在《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里曾写到一个故事：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

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吴思先生说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死者的慰安。

历史是一种力量，历史是一种社会价值。这种力量可以塑造人，阅读历史，不仅仅是得到知识，重要的是陶冶，是熏陶，是修正一些野蛮，是褒扬高贵，是赞赏正义、鞭笞不义；历史可以深邃人的心灵，为心灵增容，提升人的境界，与古人对话，尚友古代的志士仁人，从他们的血脉里唤醒自己。从这点来说，无疑历史也是一种启蒙。

历史的社会价值是一种标杆，历史规范人，使人类不敢为所欲为，胡作非为。

2011年12月6日纪念国际人权日上希拉里有场演讲《请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我喜欢这句话，所谓的“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就是受到历史的肯定的那一边。她是从人的权利而说的，但她表达了一种历史的社会价值，什么是历史肯定的？“权利不是政府赋予，而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我们的领导人是谁，也无论我们是什么人，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是人，因此我们享有权利。因为我们享有权利，政府就必须保护我们的权利。”

希拉里所谓“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应该是孟子所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应该是普世的，但历史很多的时候，百姓如蝼蚁，辗转沟壑。“人相食”，这时的百姓的命运可知。但“你我要上史书的”，用历史来提醒，用对历史的敬畏，用千秋公论来提醒：我们要选择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们要明白，人和国家和政府一样，都是会犯错误的，有时会站到历史的错误的一边。比如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平反，不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异端”罪名。

1997年，希拉里的丈夫、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四十七岁。良知终于战胜了偏见和谬误，美国政府终低头向艾迪·卡特亡魂道歉。

我想起了左拉的遭遇，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法国《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他以一个作家的良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向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政府控告“国家犯罪”，替一位犹太血统的小

人物呼吁正义。

1894年，三十五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为了所谓的尊严，其实是自大的军方心里的排犹意识，他们觉得国家绝不能向一个小人物低下高贵的头颅。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祟，最后竟然荒唐到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历史的如此荒谬，左拉拍案而起，用如椽之笔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向世人揭露军方的谎言，痛斥司法机器被民族主义绑架，成为狭隘的帮凶，左拉称这是“最黑暗的国家犯罪”。《我控诉》是良知的代言，是正义的呼吁，是为历史的正确张目，于是整个法兰西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也都开始了站队：良知人站在左拉身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颀项的军方利用权力谩骂，甚至恐吓暗杀左拉。

左拉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左拉觉得这是社会良知，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知识分子应该是敢于向强权、向不义和罪恶说“不”的一群，如果顾及自己的一己之私，对强权、不义和罪恶保持沉默，甚至如草遇风俯仰，那是一种对历史良知的背叛。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这年的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左拉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最后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然而，历史的纠错行为终于站在了左拉这边，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四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茨威格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他。”是的，每一个文字都意味着选择，因为文字也是有方向感有态度的，也会选边站。

目录

中国文史精品
年度佳作 2013

书生的骨头	詹谷丰 / 001
大汉头颅	梁爽 / 025
长平：无法消失的伤口	王克楠 / 033
洪秀全的权力人格缺少什么	王龙 / 041
暗杀与黑杀	苍耳 / 048
不幸成了王佳芝	诸荣会 / 053
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	耿立 / 064
“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特科	王铁群 / 079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陈徒手 / 086
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章诒和 / 103
我说，人应该是像你这样	艾云 / 106
直面直隶总督署	杨曙明 / 124

乱世名士牟宜之	陈一鸣 / 132
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	祝勇 / 140
巴黎为什么没烧？	柴静 / 157
在“写作组”的日子	龚斌 / 165
从小妇人说起	卢静 / 174
谁染霜林醉	诸荣会 / 180
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杨天石 / 195
钱钟书是“御用翻译”吗	钱之俊 / 210
陈布雷：真正的志向是以“言论报国”	范泓 / 218
1789 年的法国：无从改革而后革命	雷颐 / 226
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	余英时 / 229
四次血案幕后：蒋介石的智与不智	杨奎松 / 243
历史瘦弱的背影：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陈徒手 / 255
梁漱溟：寻心灵之安顿与致天下之太平	刘晨光 / 264
战争与饥荒：还原真实的一九四二	陈钦 / 268
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彭令范 / 274

书生的骨头

文 _ 詹谷丰

—

学贯中西的安徽人刘文典在 1928 年 11 月 29 日下午顶撞蒋介石的时候，他从肺腑里发出了无法按捺的愤怒。在他的眼睛里，蒋介石只是一个不懂教育的军阀，他的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三军司令的领袖权威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并不是一张自由的通行证。大学不是衙门，演讲可以、训话不行的软性盾牌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国家领袖的自尊心，因此，那天下午见面的时候，蒋主席就给了代理校长刘文典一个下马威。

“你就是刘文典吗？”看到礼帽长衫毫无惧色、昂首阔步走进来的书生，蒋介石明知故问，心中隐忍的怒气一下就点燃了。

蒋介石安坐在椅子上没有欠身，他的傲慢失礼瞬间就激怒了刘文典。

“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的称呼，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直呼的！”

从未遭过如此顶撞的蒋介石显然缺少应对不利局面的准备，他恼怒地拍击桌子，吼道：“你这个学霸！”

刘文典没有被对方的威怒吓倒，他愤怒地回击道：“如果说我是学霸，那你就是军阀！”

有关一个书生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描述，坊间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有一种说法，蒋介石气极之下，打了刘文典几个耳光，而刘文典则飞起一脚，踢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这个说法强调了事件的戏剧性，最为人津津乐道。所有的版本虽有情节和场景的差异，但一介文弱书生无视国家元首的尊严和权威，维护大学教育的规律，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却是共同的本质。所以这个事件成为了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傲骨的一个经典。

这个时候的刘文典，还没有与日后成为他终生偶像的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教授结缘，但是，他已经用独特的个性把自己独立和自由的傲骨放

置在中国学术祭坛的最高点上了，他不怕以流血甚至牺牲来维护大学的尊严和独立。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当即下令扣押了刘文典。即使刘文典身陷囹圄，安徽大学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立即释放刘文典的口号浪潮般地传到了耳里，蒋介石仍然愤怒不已。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说：“我也办过教育，我的学生有十几万人。如果有一个刘叔雅这样的人，我会下令就地枪决！”

“枪决”，这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极端词语，如今是和司法、审判紧密相连的一个因果，但是，在一个尸横遍野、战争频繁的乱世中，尤其是在军人执掌政权决定个人命运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书生的生命犹如地上的一只蚂蚁，任何一只脚掌都可以将他碾得粉身碎骨。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安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绍曾带人押走了胆大包天的刘文典，将他关在省政府的“后乐轩”里。八十多年后，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刘文典当时的心情，也无法从当时的新闻中找到记录当事人内心活动的任何蛛丝马迹。只是听到过化险为夷之后，刘文典同他的好友冯友兰回忆当年的一段话。刘文典说，当失去自由的一刻，他就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

用个人的生命换取人类社会的理想，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字背后的鲜血，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种悲壮的情怀。因此，当“杀身成仁”四个字出现在1928年的报刊上时，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我们还依稀遥望得到被囚禁在斗室中的刘文典的怒容，他那多天没有修剪的黑髭荆棘一般地竖立起来，这是一种不屈的自然反应。刘文典丝毫没有动摇拒绝蒋介石训话的决心，在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大学校园里，演讲是一种学术方式，是文人的说教，训话却是一种强制手段，是军人的命令。刘文典非常明白演讲和训话的本质区别，所以，他用“演讲”这个温和的动词彻底激起了蒋介石的愤怒。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典礼上训话，他的直白让每一个受训的人终生难忘。“你们赶快地去死，你们死了，你们的灵魂见了先总理，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安慰。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子女，就是我的子女。”

顶撞蒋介石事件并没有因刘文典失去自由而平息，书生的愤怒在报纸上持续发酵。蔡元培致电蒋介石质问：“文人学士，理当优待。今先生拘叔雅，敢问何由？”胡适更是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在下令释放刘文典的时候，蒋介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一个星期的时间，国家领袖就收回了自己的成命，更令其难以理解的是，刘文典不肯被释放，他要

蒋介石还他一个清白。刘文典说：“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

书生意气，是要靠骨头来支撑的！

二

一个浑身傲骨、目无权力的书生，他的内心却是柔软的，他的心中有无法动摇的偶像。

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课堂上，刘文典不止一次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指头，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刘文典说的陈先生，即是因顶撞蒋介石而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来到清华园任教之后认识的陈寅恪教授。如果不是这次惊险的遭遇，刘文典也许将会失去同陈寅恪结缘的机会。

岳南先生所著《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有与此相关的记载：“刘氏出狱后，根据蒋介石‘必须滚出安徽’的释放条件，受罗家伦之聘来到清华出任国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同事兼上司，也成为在国学领域唯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尽管如此，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如果不是碰到陈寅恪，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刘文典绝对就会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当他后来在西南联大得知学校要晋升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为副教授时，顿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在一个讲究学历、学位、著作，论资排辈的大学里，只读过小学的年轻小说家当然没有同刘文典争辩的资本，沈从文的沉默和回避也许就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了。沈从文不可能不知道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园里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出格行为，因此，一个弱势的大学教师显然是无法抵挡刘文典的锋芒了。

在许多次斗争中，刘文典总是胜利的一方。面对沈从文的落荒而逃，刘文典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清华园中和以后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对陈寅恪的敬佩不仅仅来自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陈寅恪独立和自由的人格魅力，更是令刘文典五体投地的根源。

1937年9月，日军侵入北平。为了保持自己的名节和抗议外族的侵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绝食绝药，用生命张扬了一个中国人的骨气。这个瘦骨嶙峋的同光体诗歌领袖，让他的后人深刻而疼痛地体验了民族的危亡之痛和生命死亡的意义。刘文典在陈三立用生命之火熄灭宣示骨气的庄严仪式中感受到了唇亡齿寒，联想到十年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应研究院同仁推举为死者撰写的碑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闪光名言，刘文典瞬间就听到了骨头撞击时的铿锵之声。

三

因为当众顶撞自己，蒋介石下令逮捕刘文典并指示枪毙的时候，没有谁真的会认为刘文典小命休矣。蒋介石的一时之气，为他带来了持久的负面影响。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学界名流的表态中，蒋介石作为党国领袖的形象显然遭到了损害。

数十年过去，后人从蒋介石的日记中看到了他的反省和自责，他对自己暴躁的脾气屡有检讨，但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党和军队大权的独裁者是不可能通过自我反思脱胎换骨的。

文人与军人，对待相同的一件事情，自会有文化和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刘文典终生都没有忘记同蒋介石那次剑拔弩张的冲突，但是，对代表着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他总是坚持一种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介书生的心中，总是有骨气构筑的人格标准。

1931年，清华园里的刘文典接到了主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的热情邀请，约他到广东小住休息。刘文典当然知道陈济棠是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军阀，但是治理南粤时热衷教育、善待知识分子的口碑却让刘文典产生了许多好感。刘文典心情大好，偕同夫人张秋华兴致勃勃地来到广州，住进了陈济棠精心安排在小岛上的一幢别墅，每天在专人伺候的吃喝玩乐中流连。一段时间之后，刘文典知道了陈济棠邀请他的目的是反蒋。刘文典当即拒绝了陈济棠丰厚回报和官职利禄的许诺，他公开表示，蒋介石曾经是他的私敌，但日本侵略军是全体中国人目前的公敌。

陈济棠对刘文典的了解是符合情理和逻辑的。刘文典从内心厌恶蒋介石，但是，在“九一八”的枪声惊醒了酣睡中的中国人，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国土，中国军队放弃抵抗的残酷现实面前，刘文典已经没有了私怨。陈济棠错误判断了一个书生在国家危亡面前的价值选择，他对刘文典的了解实在太肤浅，他以为在

他反对蒋介石的棋盘上，刘文典可以胜任一只勇往直前的卒子，却不料刘文典是一个清醒的爱国主义者。

回京之后，刘文典毫不掩饰对陈济棠的失望，他说：“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刘文典的表述彻底拧去了掩藏隐饰的水分，每一个文字中只剩下了坚硬的骨头。刘文典之后的言行和作为，更是成为他这段话的有力注释。

刘文典多次远渡扶桑，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文化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和洞察。他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各国迥然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前固然是大将军秉政，就是维新以后也还是军阀总揽一切军政的大权。”他断言，日本的国策就是军阀，军事侵略是日本的必然选择。

书生的睿智是一种文化的审时度势。刘文典知道，在一个经济落后、军阀混战的年代，国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洞察和审视，对亡国的危险麻木到了骨髓。在许多个不眠长夜之后，刘文典找到了一个文弱书生抵抗外族侵略的最佳选择。

在许多人的疑惑和误解之中，刘文典开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刘文典夜以继日，他熬红了的双眼，透过近视镜片，洞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刘文典在译者自序中说：“自从沈阳的事变发生以来，当局和民众把日本误认为一个欧美式的现代国家，以致应付无方，把国事败坏到今天这样，推原祸始，全是由于对日本的认识错误。然而，从今天起痛自悔悟，也还不算过迟，所以我以一个学问知识思想都落伍的人，凛于‘侨将压焉’之惧，把那些支离破碎的线装书暂且束之高阁，来翻译荒木贞夫的这部书。无论大家怎样的不了解日本，不肯了解日本，我总要尽我的微力。”

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刘文典，目光穿透了未来的时间。几年之后，日本侵略军全面侵华，北平沦陷，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刘文典身陷日军恐怖之下。留学日本的经历和精通日语的特长让刘文典担心和忧虑，果然，已经变节成为了汉奸的周作人找上门来，三番五次劝说刘文典为日军服务。刘文典终于恼怒了，他义正词严回绝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日本人没有料到刘文典是一个与周作人迥异的人，侵略者也不相信一个书生的骨头比刺刀更硬。日本人派出了宪兵队，凶神恶煞地闯入刘文典住宅，将刘文典珍藏的名人字画、珍贵典籍和私人信件一抢而空。刘文典身穿袈裟，毫无惧色，怒目而视。面对日本人的问话，刘文典不发一言。日本人走了，刘文典才用中国话表达一个书生的愤怒：“国难临头，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知道，晚清同光体诗歌领袖，他十二万分佩服的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

三立老人，几乎是与此同时，遭到了与他相同的利诱和威逼。陈三立老人怒骂上门游说他出任伪职的人，毅然绝食，用生命宣示了不同侵略者合作的信念和骨气。

四

逃离北平，辗转万里之后，刘文典同陈寅恪在云南蒙自重逢。在西南联大简陋的校园里，两个惺惺相惜的朋友百感交集。在日本侵略者的恶行面前，两个学术巨人失去了许许多多。陈寅恪先生，更是失去了父亲的生命。但是，他们保存了中国人的骨气，他们骨头里的钙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流失！

这是 1938 年 5 月的云南。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设在滇南重镇蒙自。光绪十三年（1887 年），蒙自被辟为商埠，设有海关、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风光一时。刘文典、陈寅恪任教西南联大时，蒙自经济已经凋敝。根据学校安排，刘文典住进了已经歇业的歌胥士洋行。与刘文典同住一起的还有闻一多、陈寅恪、陈岱孙、陈序经等十几个人。

刘文典没有想到，与他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闻一多教授，五年后竟不顾多方劝阻，丝毫不留情面地用一纸文书，解聘了恃才傲物的自己。

闻一多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坚决辞退刘文典，不仅让时人震惊，而且成为了西南联大校史上的一个事件。其中原因，并非坊间流传为金钱失节这么简单。

刘文典的“二云居士”外号，是他除了当面顶撞蒋介石之外的知名因素之一。因为喜欢云南火腿和云南烟土，刘文典一直遭人诟病，被认为颓废萎靡。喜欢云南火腿是人的正常饮食嗜好，无可非议，但留恋鸦片毒品，却是为人不齿的恶习。没有人会由于刘文典丧子之痛悲伤过度家人用鸦片助他消除痛苦而有所理解和同情。“二云居士”这个带有明显贬义的称号无异于黥在刘文典脸上的标志，让他的形象像暮色一样黯淡。

闻一多坚辞刘文典，始终同一个磨黑的地名有关。

上个世纪 40 年代的云南，由于战乱，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已经陷入到了入不敷出、典当度日的窘迫状态，许多时候连基本的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

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经常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如果领了薪水，即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如何开支度日。王力的孩子目睹父母为一日三餐发愁，便表示不再用功读书。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孩子只恨自己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个月的薪水只够维持全家半月开支，餐桌

上经常见不到任何菜肴，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全家便像过年一样高兴。

在1942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一年度教员名册》中，后人看到了国文系教授刘文典的月薪，四百七十元，这是中文系教授的最高水平。刘文典的月薪水平同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庸、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相同，比唐兰、浦江清、王力等教授高出许多。即使这样，刘文典的月薪也无法在飞涨的物价面前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典当了娘家陪嫁的首饰和过去购买的貂皮大衣，也无法维持长久，依然陷入困境当中。

西南联大教授养猪卖菜，已是见怪不怪。即使是以因钱失节的理由坚辞刘文典的闻一多教授，也未必生活得滋润，一样斯文扫地。1943年，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文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等十二位教授联名撰写《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为闻一多招揽生意：“牙章每字一千元，石章每字六百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算，润资先惠，七日取件。”以致陈寅恪作诗云：“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这个时候，普洱磨黑的大盐商张孟希派人送来书信，邀请刘文典去磨黑帮忙，一是为他已去世的母亲作一墓志铭，二是为有“瘴气”之恶名的普洱撰一游记正名。张孟希是云南闻名的富商，为人慷慨，为刘文典开出重金回报，许诺在磨黑期间，供应他所需要的烟土和全家三口人的生活费用，待回昆明时再送他五十两烟土作为谢礼。

章玉政先生在《狂人刘文典》一书中解释了刘文典磨黑之行的原因：“写骈文是刘文典的拿手好戏，在云南期间，他曾多次应邀为他人先祖、当地名人、著名建筑撰写碑记或铭文，文采飞扬，深得大名。这也是艰难时期刘文典‘为稻粱谋’的一个重要途径。至于第二点，正好符合刘文典一直的学术主张，他曾多次提出唐朝人、宋朝人对瘴气毒害的描写过于夸张，‘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辞而辟之’。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刘文典就这样踏上了前往普洱的漫长旅途。千里之外的磨黑，隐藏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结合处，没有公路通行，除了马帮的铃声，只有崎岖曲折的山水，此时却为刘文典展示了一副衣食无忧的美好画图。

刘文典在磨黑的日子过得惬意悠闲，他在鸦片的吞云吐雾和飘飘欲仙中，慢慢淡忘了昆明的艰苦岁月。但就在此时，一封从昆明寄来的信件中断了他的景致。

刘文典离开昆明不久，西南联大开始按照惯例给教师颁发下半年的聘书。清华大学有关部门的聘书也插上了翅膀，飞越千山万水到达了磨黑。

由于刘文典临行前只向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培常请假，并未告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致使系里的课程受到了一些影响。清华大学未跟他沟通径直

给刘文典寄去了聘书，使早已满腹埋怨的闻一多火上浇油，他坚决反对续聘刘文典，并要求学校立即停发刘文典的薪水。

刘文典的心情立刻如同经霜的秋叶。但是，他也没有把事情的结果想象得无可挽回，因为磨黑之行前，他已经向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培常请过假，罗培常在请示蒋梦麟之后，嘱咐刘文典安排好教学。然而，刘文典的希望闻一多的来信中破灭了。闻一多信中的每一个汉字都充满了怒气，他表示，即使收到了聘书，也必须退还。闻一多用揶揄之言泼了刘文典一盆冰水：“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

闻一多的寥寥文字，如同铜墙铁壁，最终堵死了刘文典回归清华的道路。从1929年2月被罗家伦引进到如今的十四年光阴，刘文典见证了这所大学的成长，他无法理解闻一多为何如此绝情。

刘文典的清华同学王力教授的回忆，是后人窥视刘、闻恩怨隐秘的一个管道：“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年半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闻一多解聘刘文典，当然有他的理由。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设身处地想想，在当时基本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闻一多自己也刻印卖钱，连他儿子闻立鹤也质疑他“发国难财”，刘文典给盐商的先人写墓志铭，赚点生活费，也未必就有损人格，更无关失节。

读王力先生这段回忆，我恍惚看到了闻一多教授怒发冲冠的神情。西南联大时期知识分子的节操和人格，化为了刘、闻矛盾的一个缩影。如果闻一多教授生在当代，不知他会对数十年来知识分子用报告文学献媚讨好权力和金钱的丑行甚至男性写作者求富婆包养的劣迹作何感想。

磨黑事件最终以刘文典离开清华，被云南大学文史系聘为教授结束。在这个令刘文典伤心的过程中，陈寅恪教授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写信推荐。而云南大学，则把刘文典视为特殊人才，给了他比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更高薪金的待遇。

磨黑事件中我们看到的闻一多是他坚持、倔犟和原则的一面，而他的气节和视死如归的一面，六年之后才让我们完整地看到和敬佩。由于对国家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愤怒，他直率地批判社会现实，并义无反顾地参加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活动。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纪念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大会上，闻一多慷慨陈词：“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